

女学 热点

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推动妇女事业发展

·编者按·

10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而实现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题中之义，反映了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坚持包容发展、共建发展、共享发展、平等发展的政策要求和发展取向。本文从共同富裕与妇女发展的关系视角出发，阐释了实现共同富裕对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及促进妇女共同富裕的路径。

■ 江树华

今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议题之一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10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推动妇女事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实现妇女发展与共同富裕互进共进、互促共促，成为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全新命题。本文将从共同富裕与妇女发展的关系视角出发，阐释实现共同富裕对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探讨实现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妇女共同富裕的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对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实现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题中之义，事关妇女事业发展和妇女权益保障，反映了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坚持包容发展、共建发展、共享发展、平等发展的政策要求和发展取向。

一是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了新时代妇女事业前行的根本要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及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不仅反映了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发展目标、原则和要求，从社会政策的性别视角出发，也鲜明指出了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妇女事业的要义关键。聚焦发展，紧扣发展，推动发展，回应了当前妇女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在实现共同富裕中进一步促进妇女事业提质升级指明了方向。

二是实现共同富裕彰显了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实现共同富裕直接关乎广大妇女的民生状况和发展权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全国总人口中，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占据“半边天”。实现包括广大妇

女在内的社会主义人口大国的共同富裕，是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不仅对中国妇女的民生福祉意义重大，对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的平等、包容与发展的要求，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在理念和目标上高度契合，彰显了促进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的中国特色，体现了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中国主张，展现了在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妇女事业发展的中国实践。

三是实现共同富裕回应了新时代妇女民生建设的现实需要。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和改善妇女民生建设，成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妇女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实践逻辑。在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在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中，中国妇女事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妇女权益在法治化进程中得到保障和践行，妇女民生状况不断改善。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尚不均衡，区域发展还不平衡的国情下，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和社会安全感有待进一步增强，妇女民生发展还面临着现实的挑战，诸如低收入妇女和低收入家庭的民生建设问题，贫困女童、残疾妇女、失业妇女、重病妇女、老年妇女的权益保障问题，特定女性群体的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问题等。解决好这些问题，将极大地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提升全民族的精神面貌，需要针对妇女民生建设的弱项和短板，努力解决好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中的重大妇女民生关切。

实现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妇女共同富裕的路径

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及妇女事业的进步奠定了在实现共同富裕中促进妇女事业发

展的必要基础。特别是脱贫攻坚战消除了妇女的绝对贫困，改善了妇女民生状况。但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筑牢妇女民生状况持续改善的根基，实现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艰巨任务。现阶段妇女事业发展和妇女民生状况改善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突出地表现为妇女事业和妇女民生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定反映。

共同富裕与妇女发展的实践逻辑为正确处理实现共同富裕中诸多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维度和视角，必须坚持统筹发展的思想，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特征，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全面性，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民生建设的需求、期待和向往，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动社会政策创新，加强社会政策的性别分析，不断优化妇女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一是在优化女性发展环境中促进妇女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凸显了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应当为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社会成员向上流动创造空间和机遇，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在实现共同富裕中不断增强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要在社会政策创新中加强政策的性别分析，破除影响和制约妇女发展的障碍，特别是要通过政策创新促进女性就业创业和家庭建设之间的双平衡，以及妇女生育权益和发展权益的双优化。

二是在助推女性创业中促进妇女共同富裕。要加强中国特色女性创业的引领和规划，着力培养女性创业人才，完善女性创业的服务和扶持，加强女性就业创业培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中国女性的经济影响力和贡献力。针对疫情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加强政策设计与创新，不断补齐女性创业的短板，提升女性创业质量，以创业带动就业，推动妇女实现更高质量、更为平等和更加稳定的就业。

三是在健全社会保障中促进妇女共同富裕。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安排。当前，在妇女社会保障权益不断得到加强的同时，基于性别视角的社会保障在结构、需求、政策等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目前，女性低保救助对象还占有较大比例，青年女性在子女生育、养育、托育和教育等方面面临的现实负担严重影响和制约生育愿望。因此，需进一步完善三孩政策的配套措施，科学推进女性退休制度改革，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不断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要按照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切实保障妇女享有卫生健康服务，完善妇女大病防治和救助政策，着力避免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四是在统筹效率与公平中促进妇女共同富裕。在改革发展中，要统筹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激发社会活力，进一步释放女性发展潜能，在推动创新创业和实施增收项目中促进更多妇女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三次分配”，推动慈善事业、社会捐赠和社会救助的法治化发展，以女性特有的爱心和善行展现新时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中的“她力量”，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推动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团结、增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建设文明友爱、团结互助的社会生态，对需要帮助的困难妇女、残疾妇女、困境儿童等社会群体和贫困家庭提供社会支持、社会帮扶和社会关爱。

五是在妇女组织引领服务中促进妇女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为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要求、发展指向和发展目标。在不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更加需要包括妇联在内的妇女组织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更好地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切实保障妇女权益，助推共同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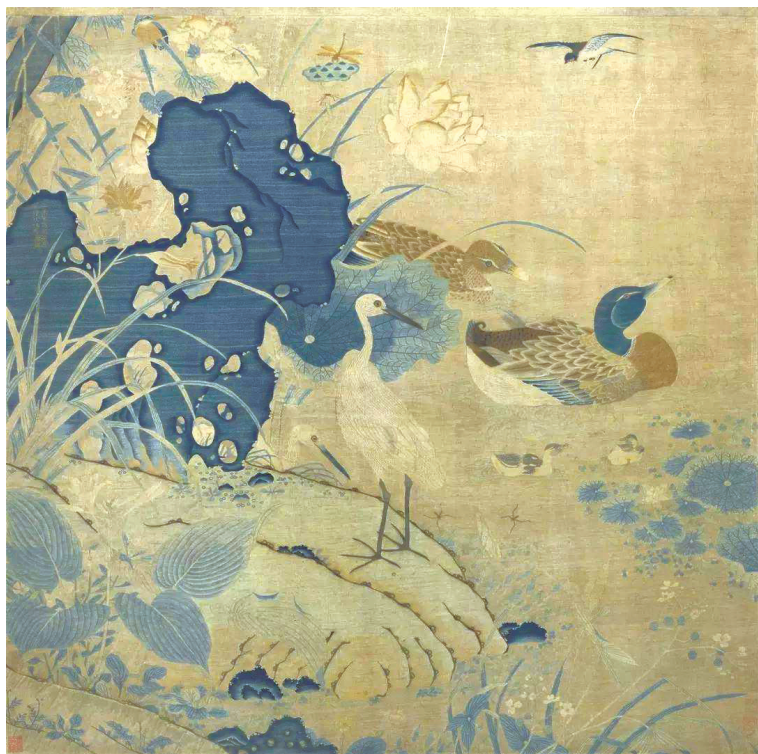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图志 华夏科技女社群芳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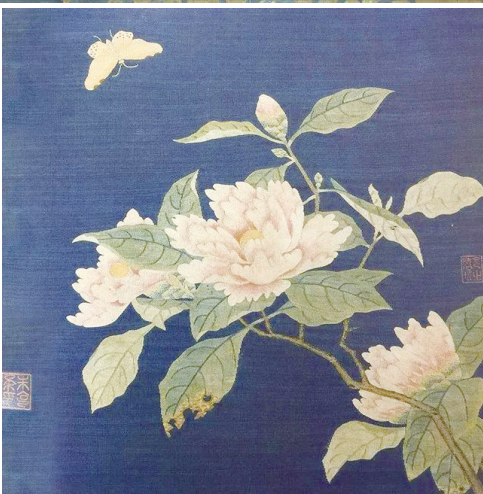
主持人：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南宋缂丝名手朱克柔：

运丝如运笔，绝技疑鬼工



▲《莲塘鸭图》



►《山茶蛱蝶图》

“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基本的劳动性别分工方式，女红被认为是古代女性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经由女红，女性的才能和德性得以体现。也为此，自古女性中女红擅长者众。朱克柔，生卒年不详，云间（今上海松江）人，宋高宗时期以织造缂丝著称于世，亦善绘画。

缂丝是一项历史悠久、织法特殊的丝织工艺，有“织中之圣”的盛名。缂丝原料为蚕丝、金线，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织造。“缂”字之义，在南梁顾野王所撰《玉篇》中称为“经纬”，画面的构成依赖于纬线的变化，织出的图案正反两面相同。由于不同颜色纬线所织成的图形彼此不相关联，因此会在图案形状周围留下锯齿状的空隙，故缂丝又称为“刻丝”。

宋代，缂丝最负盛名，无论包首、装裱，还是缂丝艺术品山水、花鸟、人物等，均已达到相当水平，并“以宣和时制作最盛”。南宋时期，江南的缂丝生产也有一定规模。缂丝作品大都摹绘名家书画，缂丝技艺在各地能工巧匠的创新中灵活运用撮、构、结、搭梭、子母经、长短戗、包心戗和参和戗等多种技法，纬丝色彩不断增加。当时缂丝的生产中心“北有定州，南有松江”，朱克柔便是松江地区的杰出代表。

朱克柔以缂丝女红闻名于世，同时也擅长作画，绘画特长对她的缂丝创作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朱克柔的缂丝作品题材广泛，有人物、树石、花鸟等，风格清淡古雅，形象生动，运丝如笔，为一时之绝技。朱克柔的代表作为《牡丹》

《山茶》《莲塘鸭图》《桃花画眉》等流传至今，既富有画意，又具有深厚的装饰趣味。其中，《莲塘鸭图》藏于上海博物馆，《牡丹》和《山茶》藏于辽宁博物馆。

“朱缂”被誉为中国缂丝技术的高峰，其作品成为当时官僚文人争相抢购之物。明代文徵明的曾孙文从简曾在朱克柔的《山茶蛱蝶图册页》上写下了一段题跋：“朱克柔，云间人，宋思陵时以女红行世。人物、树石、花鸟，精巧疑鬼工，品价高一时，流传至今，尤成罕购。此尺帧古澹清雅，有胜国诸名家风韵，洗去脂粉，至其运丝如运笔，是绝技。非今人所得梦见也，宜宝之。”清代朱启钤作《丝绣笔记》亦称其“精巧疑鬼工，品价高一时。”可见，朱氏缂丝技法极为高超。不仅民间文人雅士，就连擅长书法绘画的宋徽宗赵佶亦对她的缂丝技艺十分推崇，曾在她的作品《碧桃蝶雀图》上亲笔题诗：“雀踏花枝出素线，曾闻人说刻丝难。要知应是宣和物，莫作寻常蒂绣看。”

从朱克柔高超的缂丝技艺可见，古代女性从事的女红并不限于惯常所理解的日常家务，女性经由女红可以走出家庭，创造更高的技术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

数字平台下的治理、性别与劳动

——2021年“智能传播与数字平台”青年论坛新视点

· 阅读提示 ·

随着中国社会信息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平台正在对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重要议题。数字平台的运行与影响逻辑是什么？平台的发展及研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依托平台展开的媒介实践是否带来了新的性别问题？2021年10月9日，“智能传播与数字平台”青年论坛在上海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数字平台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性别与劳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随着中国社会信息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平台正在对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数字技术通过革新互联方式，为社会治理赋予了新的思路。与此同时，平台生成的权力关系及其对个体的精准控制也触发了诸多隐忧。因此，平台的技术原理与相关社会现象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关注热点。2021年10月9日，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苏州大学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智能传播与数字平台”青年论坛，与会学者与业界人士围绕数字平台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性别与劳动等主题进行了观点分享与交流。

平台的理论路径与社会治理实践

社会生活对互联网平台日渐加深的依赖程度使平台成为人文社科理论亟待解释的对象。与会学者对平台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深入审视，以寻求更具现实穿透力的理论路径。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从平台作为媒介、技术和资本的三种路径，阐明平台经济的本质是对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传播关系的重构。基于对中国平台经济特殊性的观察，孙萍认为将地方情境与全球视野进行结合与对比，将是拓展平台研究路径的有益尝试。

鉴于当前媒介研究多限于前台应用软件和人的能动性两端，苏州大学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马中红教授从平台中“隐藏的技术物”——“数据中台”（数据基础设施）入手，对技术与人、自平台应用、跨平台应用以及人与技术融合四方面的可供力进行研究。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易前良认为，国内新媒体研究理论建设贫弱的关键原因在于重符号、轻物质的研究范式，他梳理了21世纪以来“软件研究”“平台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等三大跨学科领域的现实背景及相互关联，力求探索关于媒介技术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理论研讨之外，与会学者将目光投向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考察平台在

其中的影响与前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孙宇将健康码平台视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考察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治理的平台化。研究发现，健康码运行背后的宏观结构性权力根植于由多方主体、多级行政部门和跨层级的治理体系构成的动态网络中。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算法运行标准，健康码实现了对疫情治理数据网络的中心化。

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专员赵宇超则聚焦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在浙江省的实地调研，解释基层政府逐渐青睐平台化治理的原因，并总结出当下平台化治理需求带来的三种变化：一是呈现出“平台产业综合体”的特质，二是数字化创新成果显现出“自上而下的创变”和“自下而上的呼声”间的矛盾，三是带来了基层社工大量“不可见”的“平台化数字劳动”。

身份再造与隐蔽歧视：性别化的数字平台

在数字化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今天，警惕算法对性别偏见的固化一直是性别研究关注的重点。此次青年论坛特设“数字化性别”分论坛，与会学者围绕人们依托数字平台展开的丰富媒介实践，透视智能传播催生或固化的性别权力网络。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潘莹以细致的经验研究，考察作为“算法系统”的平台与女性主播之间的多维、持续性关联，揭示媒介技术如何在商业化语境下对网络内容生产者进行支配。潘莹发现，这种支配方式往往是渐进、隐蔽和游戏化的，主播在自我调适的过程中对平台商业逻辑进行内化，逐渐主动嵌入平台算法而“成为系统人”。

身份再造是网络媒介实践中突破传统性别秩序的一类尝试。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讲师许娟聚焦粉丝圈层中“妈粉”这一粉丝身份称谓，通过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寻找这一群体操演“母职”身份的动机与过程。研究发现，“妈粉”是一种流动中的身份共识。这类粉丝在与偶像的互动中投注了近似“母子”的亲密情感，借用“母职”指称来摆脱异性恋框架下常见的“偶像—粉丝”关系，实际上却难以拒绝现实“母职”中暗含的性别秩序、权力和意识形态。

性别问题从来都是多重社会因素的交叠地带。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李海力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陈旭将目光投向跨文化的平台交往行为，探究澳洲某一同性交友软件语境中的种族排斥、偏见和歧视。研究表明，种族主义以隐蔽的方式内嵌于西方数字平台的技术设计中，华人女性在澳洲社会的疏离感和受排斥感在软件使用中进一步加强。

算法规训与应对：数字劳动的微观图景

在互联网催生的诸多社会变革中，就业形态变化对人民生活产生着基础性的影响。与会学者或做历时性的理论抽绎，或聚焦特定群体进行经验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呈现了数字劳动的微观图景。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在主旨发言《平台经济中的“逆向劳动过程”》中提出“逆向劳动过程”这一概念，以点明平台经济与传统产业的一个本质区别：传统产业中资本面临的问题是把购买的“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而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直接出卖劳动本身，资本面临的挑战则是维持劳动的稳定性供给。项飙进一步用人类学的概念“关联性”去解释平台经济的主要动力来源，以关联性为核心的平台经济具有很强的实验性与反思能力，或许可为平台研究的未来提供启示。

创意劳动者是近年来平台催生出的重要职业群体。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叶韦明与硕士赵鹿鸣的研究看到了劳动者在与算法系统互动中复杂的情感关系，分析他们如何感知、理解和修改平台推荐的算法系统，从而概括出创意劳动者与算法系统互动的民间理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天则用“数字灵工”来指代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文化内容创作、提供线上文化服务的青年群体。她的研究发现，知识性的劳动能够通过创意提高工作激情和成就感，但也会导致“数字灵工”进入高度内卷化的工作状态，陷入“自我锁定”“失活创意”“路径依赖”等困境。

在互联网平台的普及、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催化下，直播带货成为个体参与经济生活的新形式。复旦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曹铖的发言聚焦弱势群体的直播带货行为，认为其构成了一种基于“生存论理”的小众经济活动，他们在能动调用平台可供性以维持社会临场感、本真性印象的同时，也深陷诸如二次伤害、言语欺凌等风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姬广则根据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结果，解释年轻彝族主播们如何借助数字平台将日常生活媒介化，并剖析其建构“贫困景观”的动机。

焦点 透视